

●赵世良

往事悠悠四十年

——深切怀念丁志刚同志

丁志刚同志于1996年10月逝世了。回忆初次奉召到丁府晤谈,已过去了整整40个年头。丁公的后半生,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图书馆事业。他曾任文化部图书馆局局长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。与边远省份一名普通图书馆工作者的长期交往,无疑也反映着他广泛业务活动中的一个小小侧面。

那是1956年盛夏。丁公当时37岁,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已经两年。我25岁,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刚读完二年级,回到北京家中度假,住在西单北的豆芽菜胡同。一天,北图的马同俨同志找到我,说是丁馆长约见。我心里高兴,答应随时待命。那时丁公馆就在西四的颁赏胡同,离我家不远;但马同俨同志却说,奉命一定要用馆内的车接送。丁府是一座大四合院,丁公的书房就设在北屋东侧一间。宽敞的大书桌放在南窗正中,主人面南而坐;我则坐在书桌的西头,背靠窗户。听说丁志刚原来也曾准备赴苏联研究图书馆学,后因健康条件不果,所以对我国留苏生的学习与生活极感兴趣。那时在莫斯科图书馆学院就读的已有5名中国同学,即除我以外,还有1955年入学的4人。他们是:硕士研究生佟曾功,以及大学生赵琦、鲍振西和郑莉莉。1956年入学的彭斐章当时尚未到校。50年代留苏学图书馆学的,一共就这么6个人。我首先介绍了学校的师资状态,即承担主要课程的老师都是那时苏联图书馆学界的一代泰斗;但各种教材则多数尚未正式出版,除图书馆目录等少数一两门外,其余还都处于讲义状态。又谈到除蒙古和德国外,当时民主阵营各国都派有留学生。1955年暑

假,我曾与各校数百名中国同学乘船畅游了整个伏尔加河。从莫斯科北郊的希姆基水库出发,直到里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市,往返20多天,参观了沿岸各大城市。丁公听了这些情况极为兴奋,随时提问,热烈交谈,两个小时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。

以后国内形势变化很快,再见到丁公就是1973年的事了。那时我已从插队的农村重新回到了黑龙江省图书馆,奉派到北京去搞专题文献调研。工作结束后,我想还是应该去看看丁馆长。那天到了北图后楼,经过通报,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很忙,不大的屋子里还有两三位北图的同志在谈工作。见面之际,想不到他的第一句话竟是:“赵世良!赵世良不是一个小伙儿么?”我已年过四旬,自然是面目全非了。这句充满了山东味儿的话,似乎使我们一下子共同越过了业已流失的宝贵年华,真使人有不胜唏嘘之感。这次谈话比较短暂,我简单讲了自己的情况,说是已有一子一女,但都很小,大的还没上学。他略微讲了几句北图的情况,就互道珍重而别了。

从70年代末起,一切逐步走上了正规;每年我都要南行两三次,北京是头一站,与丁志刚同志晤谈就是常事了。1979年7月,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太原晋祠召开,丁公参与筹备并主持了大会。我则以论文作者的身份出席,并被聘为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。分组讨论时,我和丁公在一个组,他当召集人,记得同组的还有北京大学的梁思庄和郭松年等。为了节省费用,我们讨论的地点就设在大会场的主席台上。后期集体参观山西省

图书馆，途中他还把我介绍给了当时的北图馆长刘季平同志，即全国学会的第一任理事长。那年丁公整60岁，身体不错，精力很充沛。

1981年春，我在长春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为80级同学讲普通图书馆学，适值中国图书馆学会在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理事会，丁志刚同志自然来了。我去看望他，提出要请他与我们班的学生见面，他答应了。我认为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生来说，能尽量多地会见到本行业的前辈人物，是非常重要的，极有好处。那天丁馆长来到学校，40多个学生把一间不大的教室挤得满满的。他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，大家聚精会神地听，但内容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。讲话本来不限内容，事前也没商量过题目，而他则从头到尾讲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。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，勤工俭学为学校图书馆抄写卡片开始，继之以重庆、延安、徐州、济南，一直讲到北京。关于在北图的20几年，他总结个人说：“我就是运动来了红一红，运动过去专一专。”此话足证他所谈的是如何生动而又恳切。事后我想，他这种做法与我们请他来的目的，是完全一致的，即要使新一代的图书馆工作者，对本行业的过去有更多的具体了解。同学们，也包括我，都上了极为有益的、难忘的一课。

记得是1984年，全国图书馆学刊物研讨会在大连市的旅顺召开，由丁志刚同志主持。我作为《黑龙江图书馆》编辑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。该刊创办较早，我是在1983年初接办的。与会者不过40多人，没设主席台，大家面对面地坐了一大圈。座谈开始，丁馆长竟头一个点名要我发言。我虽觉得意外，但毕竟略有准备，就讲了点情况和看法。有人半开玩笑地评论我们的刊物说：大家都没办刊时你们属上游，现在则是下游里的上游。丁志刚同志听后也乐了。此刊不久即为双月刊，并通过邮局在全国公开发行，后来改名《图书馆建设》，现在已进入全国同行业期刊的十佳之列了。

因与会人员彼此都很熟悉，早晚时常相互串门，大家到丁志刚同志屋里叙谈也非只

一次。可以看到，每天早晨他都在居室前认真地做早操。

1986年，中国图书馆学会在贵阳召开读者工作研讨会，我参与主持。报到后，听说丁馆长已先期到达，去了遵义。很快传来不幸的消息，说是他病倒了。好在病情很快稳定下来，只是从此要坐轮椅了。但他仍能写字，还作了不少诗；我曾接到过他的好几封信，还有诗稿。

1989年的一天上午，我到他在北京和平里的家中去看望他。他非常高兴，说了许多话。当时正好我刚为南京出版的《杜定友先生遗稿集》写了一篇代序，题为《事业是世代相承的》，就把其中的观点讲给他听，还背诵了一些段落，他听了频频点头称是。后来他提出请我吃烤鸭。我看他行动不便，又怕对他的病体不利，就说等他康复再吃吧！他说不费事，可以买到家里来，他自己也想吃。我只得从命。鸭子上桌后，阿姨小楼卷了一张薄饼递到了他的手里。他把饼一举向我让了一下就吃起来，我赶紧相陪。告别时自然还相约常来看他，谁知后来由于其他俗务缠身，我竟有7年多没进山海关了。

1996年9月下旬，我从国外回到哈尔滨家中过节。见到省图书馆里参加了国际图联北京大会的朋友们，他们都说会上不止一次地见到了丁馆长。知他身体、精神都好，我极为欣慰，就写了封信向他问候，并提出打算为他写一篇专访，请他准备素材，多谈谈近年来的动态与想法。又说如果写书面材料费事，我可以在明年秋天去北京时带着录音机去看他，请他讲就行。

过了国庆节，我正等他的回信，谁知收到的竟是讣告，不禁悲从中来。呜呼！死生亦大矣！专访成了虚话。只能将这些往事记下来，权充一瓣心香，敬献于丁公灵前，作为对他的怀念吧！

（来稿时间：1996.12.14，编发者：刘喜申）